

埃及学与汉学的渊源

王海利

今年是埃及学诞生200周年。作为研究古代埃及文明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埃及学以解读古埃及的文字文献为基础，全面研究古埃及历史、宗教、艺术、建筑以及科技等。埃及学的诞生以1822年法国学者商博良破译古埃及文字为标志。此后，古埃及石刻、壁画、雕刻、文书上的秘密逐步揭开，人们得以触碰到遥远但真实的古埃及文明。

近几十年以来，更多学科开始介入埃及学，交叉研究兴盛不衰。中国与埃及都属于文明古国，对人类早期文明做出巨大贡献。埃及学与汉学的比较研究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

人们通常把埃及学的产生归功于商博良的天赋和勤奋。商博良的确堪称语言天才，他不仅精通古希腊语、拉丁语等西方语言，而且通晓汉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希伯来语、科普特语等东方语言，甚至养成了使用科普特语写日记的习惯。科普特语是古埃及语的最后阶段，这一时期的埃及人借用了希腊字母，同时也沿用了埃及世俗体中的6个字符记录希腊文中没有的音素。因此，科普特语对于研究古埃及语，尤其是破译古埃及文字具有重要价值。

历史地看，商博良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取决于多种因素。试想，如果没有罗塞塔石碑上的多语对照碑文，他不可能破译古埃及文字；若没有其他学者的共同努力，尤其是法国学者德·萨西、英国学者托马斯·杨和瑞典学者阿克布拉德等人奠定的基础，商博良在埃及学研究上的成功恐怕也无从谈起。

同时，随着国际学界对汉学和埃及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比较文字学的发展，研究者发现商博良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商博良所了解的汉语知识，也对他成功破译古埃及文字起到了重要作用。欧洲汉学的建立和发展助力了埃及学的诞生。

在商博良之前，欧洲汉学已有长久发展。1585年，西班牙人门多萨撰写的《中华大帝国史》在意大利罗马出版，为当时的欧洲打开了一扇认识中国的窗口。1669年，英国建筑师约翰·韦布出版《论中华帝国之语言》可能即为原初语言之历史论文。这是西方较早广泛论述中国语言的著作，将中国语言放入世界语言研究范围内。随着西方对中国语言文字研究的逐步深入，18世纪以降，欧洲开始出现研究汉语语法的著作。

虽然那一时期的欧洲学者对于中国语言文字的认知逐渐丰富起来，但他们普遍认为汉字与埃及文字同为图画文字，直接通过图画符号表达思想和概念，因此不与口头语音发生联系。直到19世纪普通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建立后，这一认知才开始改变。

1814年，法兰西学院正式设立汉满鞑靼语言文学讲席，由年轻的汉学家雷慕沙主持。它的设立，标志着法国乃至整个欧洲专业汉学的诞生。

雷慕沙和商博良同为德·萨西的学生，他刻苦钻研汉语，先后出版了《汉文简要》和《汉文启蒙》等著作，构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汉语语法教学体系。“反切”是中国古代最常见的汉字注音方法，采用“上字取声，下字取韵”的原则。欧洲人曾将“反切”的原则错误理解为“元音+辅音”，即第一个字取元音，第二个字取辅音。直到雷慕沙在《汉文简要》中以“可汗”一词为例，才对“反切”进行了第一次准确介绍。这也让商博良认识到，

既然汉字可以表音，那么古埃及文字也很可能如此。

长期以来，在西方研究的视野中，古埃及文字具有的图画特点令很多研究者产生了误判，他们认为古埃及文字隐藏着祭司的神秘智慧。商博良在对汉语的研究中意识到，古埃及文字研究需要摆脱以往那种象征性、隐喻性的解读模式。

商博良通过罗塞塔石碑上托勒密名字的书体、世俗体和希腊文三种不同文字的对比，来识别特定字符的音值，很快就读出了托勒密的名字。这使他意识到了古埃及文字实际上记录了古埃及人的语言，而不是所谓的象征神秘智慧的符号。后来，商博良又陆续读出了克里奥帕特拉、亚历山大、凯撒等人的名字，从而发现了解读古埃及文字体系的真正钥匙——“表音”。

雷慕沙对中文的“形声”概念也做了详细介绍，指出以形声方式构成的汉字的数量占据汉字总数的一大半。“形声”这一概念，也使商博良进一步认识到汉字的表音特性，尤其是形声字在汉字中数量如此丰富，使商博良对古埃及文字可以表音的认识更为坚定和明确。

1822年，商博良在法兰西科学院发表《关于象形文字语音学的字母——给达希尔先生的信》的报告，公开了他对古埃及文字的新发现。1824年，商博良在《古埃及文字体系概要》一书中指出，古埃及文字的“表音”远比他最初推测的更为广泛，古埃及文字的表音不是辅助而是核心，是整个古埃及文字体系的“灵魂”。

商博良的研究著作涉及中国语言文字知识的诸多方面。他在1841年出版的《古埃及语词典》中有60余处提及中国，涉及“六书”（即汉字构成和使用的6种方法，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与“三才”（指天、地、人）等概念。在该书的序言中，他对中国文字与埃及文字的差异之处进行了详细比较，并参考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对汉语词汇的分类，对古埃及词汇进行了分类。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值埃及学诞生200周年之际，回顾古埃及文字解读的历程，我们发现，汉学对埃及学的发端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古埃及文字的破译暨埃及学的诞生，正是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产物。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双礁环抱，水流平缓，深度适中，且为泥质海床，便于海船避风、泊驻与航行，堪称天然良港。

联合考古队还发现了成片分布的大型建筑遗址和两处排列有序的大型墓地，并清理出一批珊瑚石墓葬，采集了较多的文物标本，包括青铜砧码、波斯釉陶、阿拉伯陶器与釉陶、玻璃器物和黑曜石器等。各种生活遗迹与疑似海滨货场遗迹的发现，生动展示了历史上海港的繁华场景，为研究塞林港的历史文化内涵提供了重要考古证据。值得一提的是，同一类型的珊瑚石墓，在我国海南岛的三亚、陵水一带也有发现，从侧面印证了这座港口与中国往来的悠久历史。

在遗址的多个地点，联合考古队队员发现了分属不同时期的中国瓷器残片，包括宋元时期的莲瓣纹青白瓷残片、龙泉窑系的青瓷残片，以及明清时期漳州窑系的青花瓷残片等。这是红海地区港口遗址考古中首次发现中国瓷器残片。

帆影苍茫，舟楫相望。1431年，马欢来到麦加时所携带的物品清单中即有瓷器一项；而他早近百年游历红海地区的元代旅行家汪大渊，也记录下中国瓷器在古代中东地区市场上销售的情景。今天，中沙联合考古队在塞林港遗址中发现的中国瓷器残片，印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姜波认为，中东地区的诸多考古实证显示，可能早在唐代，中国与包括红海在内的中东地区已经进入一个陶瓷贸易交往的高峰时期。

联合考古促进中沙友谊

随着塞林港遗址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中沙两国考古队队员相互协作，彼此间建立起深厚友谊。在工作现场，中方考古队队员梁国庆身边总会围着多位沙特同事，向他学习中国传统石刻拓片制作技术。这一技术在本次考古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部分墓葬中发现的阿拉伯文石刻，因多年风沙侵蚀，碑文已模糊不清。拓片技术让碑文变得清晰起来，碑铭释读也为了解遗址年代、族群文化、贸易背景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沙特考古学家已经开始学习中国拓片制作技术，希望在未来的考古工作中推广使用。

沙方队员对于当地情况更为熟悉，他们与中方队员密切交流，令考古发掘工作更加高效。拥有近15年考古经验的麦迪曾于2017年赴中国广东省参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水下考古培训班，是沙特首位获得此类专业证书的水下考古队队员。在水下作业时，熟悉红海水况的麦迪犹如潜水教练，向中方队员悉心传授工作技巧。在肩并肩的工作中，中国考古队的丰富经验，每每也让麦迪等沙特队员感慨不已。

在丝绸之路的联结下，阿拉伯半岛与中国在商贸、文化等领域的往来历经千年，塞林港是双方友好交往的例证。沙特国家考古中心主任扎哈尼称赞中沙联合考古队的工作模式，认为中方开展的传统手段与无人机等创新科技相结合的考古方法值得借鉴。他期待，未来双方在红海沿岸、阿拉伯湾等更多历史遗址开展更深入、更广阔的考古合作，续写东西交融、互学互鉴的佳话。

车赛道。在这条赛道上，将不定期举行赛事，比赛通过编程模拟进行，赛事执行现实标准。由特定的软件控制赛车，每个动作指令能在50毫秒内反应出来，这意味着每场比赛都会出现不同的赛况。赛车由3D打印技术制造，车体由0.03毫米厚的塑料片组成，涂装完全参照实车，甚至包括细小的赞助商标识。据介绍，摩纳哥赛道运行的复杂和精密程度，将远超2011年启用的汉堡机场场景，后者可以根据航班时刻表准时起降降落各种飞机。

微缩景观世界团队经过一年半的研发，于今年正式开放其虚拟现实体验空间。游客们可以在虚拟现实设备的帮助下“缩小”自己，更加身临其境地畅游迷你世界。

在中国，同样有微缩景区，包括北京世界公园、长沙世界之窗和深圳锦绣中华。它们满足了人们一天“游”遍世界的心理。今天，从实体的“建筑”微缩景区，到科技赋能的“主题”微缩景观，中国也在不断建造新型微缩乐园。在上海外滩，2019年建成开放的“赛梦·微缩世界”尽管只有1000多平方米的空间，却容纳了“外滩百年风云”“微缩跑马厅”“猎奇魔幻小镇”等体验模块，除了精湛的工艺，各类声光、电动的数字化科技都令观众流连忘返。

微缩景观世界通过审美化的人造空间，创造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场景。它以客观生活为参照，借助人们的情感和想象力再创造，这里的真实是一种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心理体验。船只在水面移动，运载着货物与游人，岸边的客人边喝咖啡边欣赏风景，打球的少年在烈日下奔跑，一件件模型将时光定格，生动呈现着世界各地的生活场景，令人浮想联翩。

为打造更加逼真的微缩世界，制作团队常常会在当地逗留数日，感受当地魅力，记录所看到的场景，将联想与思考融入其中。场景中的生活气息是微缩景观艺术的重要支撑，而微缩景观又建构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我们不在场的、可以跳脱出来的、无拘无束自由想象的世界。在微缩景观世界里，人们在观赏世界风景的同时，获得独特的审美享受。

（作者为中国人民美术学院教授）

红海上的丝路记忆

周轲



图①：中沙联合考古队在塞林港周边海域搜索古航道。

图②：塞林港遗址发掘出来的建筑墙体。

图③：塞林港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残片。

图片均为中沙联合考古队中方领队姜波提供

掘，取得了超乎预期的成果：发现并确认了古海湾、古航道和被流沙掩盖的季节河遗迹；探明了塞林港建港缘由——这里既有海陆交通之便利，又可为海船提供淡水补给，是海港选址的绝佳地点。

在海湾海床，联合考古队发现了早先河流带入的淤泥沉积，且堆积深厚，说明此处河海交汇，淡水充足。在遗址南侧水域，联合考古队还确认了一处可供泊船的港湾，找到了古代船只进出港湾的航道。这里港湾

在海边进行的沙漠考古

阿拉伯文献记载，塞林港最繁荣兴盛的时期是公元9世纪至13世纪，来自世界各地的商旅搭乘船只从这里登陆，前往麦加或其他贸易城市。公元15世纪，明朝航海家郑和率船队出使西洋，最远经塞林港抵达麦加。船队靠岸后，用瓷器、金银、丝绸、茶叶和铁器等与当地居民交换特产与礼物。随行翻译马欢将其在红海沿岸的所见所闻收录于《瀛涯胜览》一书。

2018年3月和2019年1月，中国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沙特国家考古中心的10余名考古工作人员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塞林港遗址开展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这是中国考古队首次来到阿拉伯半岛。联合考古队中方领队、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姜波将这次联合考古工作形容为“海边的沙漠考古”：考古队队员不仅要在地面上开展田野发掘，还要潜入水底进行探索。

高温酷热、风沙肆虐，恶劣的自然环境是联合考古队面临的一大挑战。太阳炙烤下，沙漠的表面温度可高达50摄氏度，说来就来的沙尘暴更是顷刻间遮天蔽日。为避开高温时段，考古队队员清晨5点便要前往现场；沙尘暴一过，被中断的工作便又迅速展开。

茫茫大漠之上，中国考古人寻找地下遗址的“传统绝技”洛阳铲钻探技术一时难以施展。“沙子是流动的，洛阳铲打不下去，就算打下去，一会儿就又被覆盖了。”姜波与考古队队员经过反复研究，将传统的田野考古方法与遥感考古、环境考古以及无人机航拍、数字测绘与3D技术等结合起来，为全方位研究塞林港人文历史与地理信息探索新的途径。

在陆地田野作业中，联合考古队在遗址地表设置了9条纵贯南北的调查线路，进行地毯式搜索；发现重要遗迹后，再利用无人机从不同高度对遗迹进行航拍和遥感测绘，建立三维模型。在水下考古环节，中方考古队队员提前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水下考古培训，为后续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良好基础。两国考古队队员通过海底调查、搜索和采样，摸清了塞林港周边海域的水底状况。

出土文物印证丝路繁华

中沙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的两次发

微缩景观里的大千世界

黄华三



图为微缩景观世界一景。

黄华三供图

德国汉堡市中心易北河岸，在世界文化遗产“仓库城”的红砖建筑群中，隐藏着一个“微缩景观世界”：近30万个人偶、4000多座桥梁和房屋、13万棵树木、逾万辆汽车、38万组LED灯具、1.6千米长的轨道、1000余列火车，内含世界上最大的铁路模型动态场景……其细节之精致，令人赞叹不已。

微缩景观世界的奇妙设想与创意，源于德国人弗里德里克·布劳恩2000年在瑞士苏黎世的一次旅游。偏街小巷中一家卖铁道模型的商店，唤起他对童年的美好回忆。回汉堡后，弗里德里克邀请兄弟格瑞特和朋友斯蒂芬·赫兹一起建造铁路模型。

2001年，微缩景观世界初步面世。弗里德里克团队的创作并未止步，他们的目标是塑造一个更加完整的模型世界。为此，他们拓展规模，从最初的1500平方米扩展到7000多平方米。目前，这一景点已拥有数万个小场景，它以交通设施为主线，展示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特色风貌和标志性建筑，如瑞典的冰天雪地、埃及的金字塔等，甚至还有虚拟城市“克努芬根”等。在这个世界里，规划整齐的建筑群配有各式各样的交通设施，还有细致入微的日常生活场景。无论大场景还是小细节，处处都能让人感受到设计者丰富的想象力和制作者精湛的手工艺。

